

教

现代道德话语的形成

——从马基雅维里到康德

丁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
奇
解

周氏道德知识的形成

——从周氏道德知识的发展

王 强

教

现代道德话语的形成

——从马基雅维里到康德

丁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道德话语的形成：从马基雅维里到康德 / 丁凡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6

ISBN 978 - 7 - 5203 - 0635 - 5

I. ①现… II. ①丁… III. ①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 - 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999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29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马基雅维里的道德革命	(8)
一 命运, 还是“能力”?	(9)
二 君主与共和:《君主论》	(16)
三 君主与共和:《李维史论》	(27)
四 爱国主义现实主义诸问	(41)
五 小结	(51)
第二章 培根的技术世界	(52)
一 科技乌托邦的政情	(53)
二 代达罗斯问题	(65)
三 营销大师	(78)
四 小结	(96)
第三章 霍布斯的政治科学	(98)
一 两可的主权论	(99)
二 被误解的“权力”	(106)

三 被扭曲的正义	(118)
四 霍布斯的“法网”	(139)
五 结语	(154)
第四章 卢梭的遁世与经世	(156)
一 德性之“劫”	(157)
二 “理想世界”与人的世界	(167)
三 立法与行教	(183)
四 世界的边缘	(197)
五 结语	(211)
第五章 康德与现代“自我”	(213)
一 形而上学与道德哲学	(214)
二 国家问题	(221)
三 革命问题	(226)
四 历史与信念问题	(234)
五 结语	(239)
附论 历史写作与问题意识	
——对修昔底德《考古学》的考察	(241)
一 历史的脉搏	(242)
二 金权视野下的政治世界	(249)
三 “修昔底德陷阱”	(255)
四 关于出路的思考	(258)
参考文献	(260)

前 言

道德话语是时代风尚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它既是某种时代精神的结果，同时也能对社会文化风尚与道德氛围产生强大的影响，因为它会以各种或笨拙或微妙的形式深入到精英教育、媒体宣传以及大众文化之中，从而成为形塑社会的一种强大力量。因此，毫不夸张地讲，道德话语的品质是事关一个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前途命运的大事。

当今道德话语的基础是从西方现代早期开始逐渐成形的以个人为基础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学说，并最终由康德为之提供了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体系。但是，这种特殊的道德话语，其品质与效用却难以令人满意。翻开 16 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我们一方面能看到生产力水平与商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贫富两极分化与对立的不断加剧、战争的频度与破坏性不断增加、环境恶化的速度不断加快、经济社会体系稳定性的一再下降以及人道主义灾难的不断升级。这两方面的对比并不能令有识之士接受“利大于弊”的结论。后一方面的种种令人忧惧的现象表明，现代化进程开启之后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健康的世界，因此，推动其运转的机制必然是有问题的。

这一机制几乎被一致认定为是所谓的利益逻辑或资本逻辑，然

而，它从来不曾取代道义原则而成为任何一个特定社会的公开与正当的最高理想。它的危害性从来不是秘密，任何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一旦形成哪怕只是半公开的利益交换机制，都将给思想、政治以及文化精英的培养、选拔、任用以及更替机制带来致命的恶劣影响。其结果无一例外都是社会分裂、结党营私与相互倾轧，然而，需要对这种“率兽食人”的景象负责任的却不是这些几乎天生就只懂得一己之私的“利益个体”或“交易行为主体”，而是对思想、政治与文化中的“正气”天然有责的思想精英、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因为无法抑制利益逻辑的文化是不能被称为“文化”的，思想、政治以及道德伦理的情况也都是如此。

因此，作为与各方面都有密切关联的关键环节，道德话语问题必须成为反思的重点对象。而对道德话语的关注就必然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为数不多的那几位对现代人的“心灵”产生了最重大影响的思想人物身上。

本书中所选的人物都是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中最重要的核心人物，关于其中每位思想人物的政治、法律、社会或道德思想都已有大量优秀的研究著作，但是以道德话语为视角的研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开展。这是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它与思潮史或意识形态史的研究方法略有不同，它当然包括理论或思辨的逻辑分析与社会历史考察等内容，但又不完全与之等同，因为它特别注重并突出了思想者或理论家同时也是教育者或塑造者的特殊身份以及与此身份密切相关的“修辞术”问题。

本书认可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马基雅维里造成了欧洲近代道德氛围的根本转变。这也是本书选定思想史断代起点的逻辑前提。关于马基雅维里，所谓政治与道德相分离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可能自圆其说的，因为政治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个道德“中立”的场域，它

永远不可能回避善恶对错的基本命题，也永远不可能站到“善”与“正义”的对立面而免于罪责与口诛笔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没有人会忽视马基雅维里对国家生死存亡问题的过分强调，但是马基雅维里对这一问题的强调却有两个面相：一方面，强调生死危机的时刻存在并由此而要求治国者随时准备使用非常手段；另一方面，马基雅维里非但不提供长治久安的办法，反而以极度冷静而“理性”的虚无主义来“激励”人们“勇敢”接受“一切终将归于消灭”的“事实”并积极投身于帝国主义的人间“正道”。因此，作为某种特殊的教育者，马基雅维里其实是在以某种“患失+绝望”的歇斯底里来扭曲甚至败坏政治精英以及潜在的政治精英的基本判断力，并最终凭借“史家”的姿态与“智术士”高超的修辞术而获得了少数“上智”与无量数“中人”与“下愚”的或严肃或戏谑的赞同。其结果非但不能使国家获得安全与稳定，反而会使得一国之内纷争不断加剧、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步步升级、政治人才队伍不断凋敝并最终引向全面危机。

正是从这个被夸大的危险开始，欧洲所继承的古典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都成为了不可信任的致弱之道，而欧洲人充满痛苦与灾难的道德重塑过程也正由此拉开帷幕。只是，由于这个开端的极为微妙的破坏性，欧洲的道德重建始终未能准确找到问题的根源，因而非但没有及时解决这一根本文教问题，反而在个人主义、恐惧、不信任、抽象道德以及享乐主义等要素的作用之下，越来越呈现出内涵混乱、导向不明的严重问题，并且，这一问题早已随着殖民运动和全球化而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培根大兴自然科学技术的建议与“本撒冷体制”的规划为马基雅维里的帝国游戏提供了正当性与武器库。霍布斯则以契约论、自然权利、自然法、和平以及主权等基本“名词”

为根基搭建起了一整套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看上去，马基雅维里与培根的帝国主义“理想”对于一心向往和平的霍布斯而言并无任何吸引力，权谋诈术或科学技术霍布斯也是一不信任二不欣赏，然而霍布斯不上不下的“现实主义”却一方面在以“和平”为唯一目标的前提下“认可”了国际社会永久的自然状态与这一状态在利维坦内部随时可复的糟糕性质，另一方面又在高扬主权的同时“忘记”了给“主权”一副至少可称“健全”的身体。

卢梭对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及其骄矜傲慢的“上流社会”充满了义愤，他以道德的名义对“文明人”与“文明社会”发起的近乎毁灭性的批判震惊世人，道义的应有地位似乎是得到了恢复或至少是有了恢复的希望，然而卢梭始终挣扎摇摆于经世与遁世之间的心灵却为个人的修德成善与家邦的仁义之政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他在孤独逍遥之中无法安享内心的宁静，因为他并不能真正的忘记社会生活与全人类；他在思考社会政治问题时不敢聚焦于统治者的德性与责任，因为他只想留下一部神奇的法典就飘然离去而不敢承担起政治家繁重复杂的工作。于是，他只好要求人类的生活变得尽可能的简单，吃穿用度、头脑心灵都要简而又简以至于政府只能行“无为之治”。这种拒绝向上的基本态度并不能为道义原则赢得真正的力量，“质朴无文”也不是德治的目标，真正的文明生活必须以真正的高雅文化为指引。卢梭“复兴”道义的努力非但没有对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提供充足的正能量，反而助长了“愤世嫉俗”与“避重就轻”的不良倾向，从而既断了“好人”之路，也绝了“好公民”的来源。康德是这场道德重建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道德自主、自由主义、毫不妥协的道德戒律、帝国主义、和平主义、尘世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逐利的个人主义、道德的个人主义、种族主义以及世界主义等相互矛盾重重的要素统

被康德整合到了同一个道德哲学体系之中，从而使得这套话语既便于自命清高，又不必然要求政治权力以至惊扰阻碍商业社会本身机制的运转，还可成为对其他文明体横加指责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的话语利器。

中国正是这场绵延数百年的帝国游戏的最大受害者之一。然而无论是数以千万计的人命损失、数以亿计的赔款与其他珍贵文物之劫难，还是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割地，滔天罪恶竟然仅凭“落后”二字便想一笔勾销。并且，这“落后”的帽子竟然从“奇技淫巧”到“政教法度”并最终扣到了“中华文明”本身之上。“仁、义、道、德、礼、乐、刑、政”的完整体系与“修、齐、治、平”的完整序列在道义之正当性上竟然敌不过悖德之私欲与无礼之自由。道义之殇，岂有甚于此者耶？然而，在这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浩劫之中，中华文明证明了自身中所蕴含的惊人伟力。百年丧乱之后，新中国一扫海内妖氛，经六十八年艰苦奋斗而有重回巅峰之势，如此奇迹，文明史上仅此一见。这不仅仅是中国之幸，也是人类之幸。

然而，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于今之世，“挨打”与“挨饿”之虞已不足忧，唯独“挨骂”一事，其状之烈似仍不减百年之前，种种“专制”“封建”甚至“愚昧落后”等新文化运动年代的“标准”用语仍然挥之不去。这个现象乍看上去是令人难以理解与接受的。毕竟百年前严复已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之觉悟，毕竟康有为周游列国之后亦明所谓西方文明乃“就外形而观之，非就内心而论之”，毕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看清楚“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之后，中国就已经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这条“中国道路”在争议中走到今天，已有近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国势之壮盛引发西方世界的震动与热议也已有十几春秋。2004年5

月,“北京共识”第一次将中国作为头号反例摆在了“华盛顿共识”的正对面,此后关于“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讨论更是随着次贷危机而越发热烈,然而,中国共产党在“绩效”(performance)方面的超级表现似乎仍不足以让所有的“道德”指责都变成世人眼中的“酸葡萄”,“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大专制政府主义”、“不公正”、“剥夺农民”、“野蛮生长”、“低人权优势”等“解释”模式似乎仍然难以攻破。“中国道路”需要一个深刻而全面的解释与评价。因为,对于作为文明大国的中国而言,仅有“绩效”显然是不够的,中国共产党的功过得失必须在更高级别的道义天平上获得其“应得之分”——既有的所谓“现代道德话语”远不足以评判中国以及人类其他文明的历史。中华文明传统对道义的理解与实践才是中华文明的精魂所在,在中华大地上,暴力、利益、权势或任何不义从来都不可能取得“稳定”的容身之所,无论冠以“国家”、“民族”、“历史”或何等名义,不义永远都只是不义。因此,中国虽只一国,然而中国之所怀却从来都不是一国狭隘之善。对于中华文教独一无二的“天下”维度,东西方有识之士早有共识。英国史家阿诺德·汤因比早已于五十年前便指出,由于中华文明本身的特质,人类文明之未来与希望必在中国。以彼时中国之样貌,汤因比此言不免被认为是故作惊人之语,而以今日之势观之,汤氏之远见卓识的确令人赞叹。另有,刚刚故去的美国前安全顾问、著名地缘战略学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称中国乃是以一己之力在反抗整个不公正的世界。以布氏的特殊身份而有此语,中国之于人类的伟大意义可知不谬。结合两位远人之高见,可确知中国无论是以文明逻辑还是现实作为而论,虽不完美,而皆可无愧于中国之“中”与道义之正。

习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大任

务，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事业的理解与谋划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的确，若不能最终恢复道义与文化上的应有地位与领导权，中国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成就都将黯然失色并最终归于寂灭。人类历史上岂有一个文明体是以生产与供养的能力抑或暴力杀戮与剥削榨取的能力而成就“伟大”二字并传诸久远的？世人所知之诸“大国”——荷、西、葡、英、美、德、法、日、俄等——莫不以此两类能力而起，至今未落者唯危机四伏、名声扫地之一国而已，中华文明之伟大复兴，必不可堕此邪道之窠臼。而避之之要，首在重审“道德”之真，而廓清义理之正。

本书不揣浅陋，谨以道德话语为视角，敢效一察之微明。学力所限，必有种种不足，敬请方家指教。

第一章 马基雅维里的道德革命

马基雅维里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人政治思考的方式，这早已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然而，如何理解这一转变却始终众说纷纭。各方争论的焦点最终集中在了一个看似极为简单的问题之上：马基雅维里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是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最难以回答，因为善恶问题乃是终极之问。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够理解，与马基雅维里的命运最为紧要的问题——道德与政治各有各的逻辑还是相反——其实是一个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简化为：善恶问题是不是治国理政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的问法已经决定了，它的答案必须是坚决的肯定，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别无选择的道义问题，而非事实问题。

以上绝非文字游戏，善恶问题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这一切。而这也正是马基雅维里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乃至西方文明史上一大谜题的原因，此人究竟有何超绝之能，竟能使人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犹疑不决，甚至于能令饱学之士也信从“此人使得政治与道德相分离”这样经不起推敲的简单说辞？欲行悖理之说，必定不能遵循理性的法则，因此，马基雅维里的修辞术必须成为正人君子重要的观察点，如此则马氏种种对于特定历史的剪裁、对于特定人物的回避以及对于特定理论传统的躲闪背后的用意才能大白于

天下。

一 命运,还是“能力”?

《君主论》甫一问世便为其作者招致了一个恶人的名声,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书中对人类基本道德情感的蔑视与伤害是骇人听闻的。然而,这本“邪书”的手抄本在欧洲政治圈与知识圈中的广泛流传似乎又早已预示了马基雅维里道德声誉与思想命运的反转。在欧洲近代著名文化代表人物中,培根对马基雅维里的巧妙使用深刻地展示了其思想的强大力量,这种高超的使用方式包括对后者思想基本大端的认同与对小节的无关宏旨的批评。而在所有的认同中,除了纯粹立场性的内容之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条理由便是马氏自诩的“求实”态度。培根试图使读者相信,古典哲人以及基督教神学探讨的完全都是“人应当怎样生活”,而马基雅维里只不过换了一个方向,转而研究一番“人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① 霍布斯与斯宾诺莎实际上也都采取了与培根一脉相承的看法与做法。^②

在以上述三位为代表或先驱的现代政治理论所继承的马基雅维里思想基本要素中,引起了德国著名史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的特别注意的却是其对基督教的拒斥,于是,奥古斯丁对于道义

① 培根在对古典政治哲人的批评、对基督教彼岸性的拒绝、对道德理想的否弃以及对“国家理由”的认可等方面,均与马基雅维里保持一致,而所批评的只是马基雅维里在修辞方面的不审慎,以及细节方面的欠周全。参阅[英]弗朗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十八(3)、二十(8)、二十一(9、11)、二十二(13);《培根随笔全集》,蒲隆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十三、十五、二十九、三十二、三十九、五十八。

② 两者与马基雅维里深相契合之处仍在于对古典政治哲学以及基督教道德主张的拒绝。[荷兰]斯宾诺莎:《政治论》,冯炳昆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一、二章。

原则的坚决主张便被迈内克提高到了西方政治文明转折点的高度。^①也就是说,在迈内克看来,马基雅维里没有那么重要。在奥古斯丁之前,在没有“普遍性宗教”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国家理由”早已是见怪不怪的基本事实,一份包括了亚里士多德、色诺芬、修昔底德、欧里庇得斯、西塞罗、塔西佗以及李维的长名单足以为证。^②然而另一方面,迈内克也在告诉人们,所谓的“求实”态度其实也不重要。之所以要将奥古斯丁抬高到转折人物的高度,是因为在迈内克看来,奥古斯丁所关注的“道义”问题本身就比较真理问题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对于马基雅维里问题的思考,必须上升到道义原则的视野,否则必定或为不得要领,或为掩人耳目。^③正是马基雅维里在道义原则上做出的改变使得他本人成为了奥古斯丁之后的又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与后者相比,马氏在道义的高度上略逊,而在复杂性与影响力方面,马氏却远在希波大主教之上。^④

唯有以道义的视角才能找出马氏在道义上翻身的道理,斯宾诺莎与卢梭为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这两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对马基雅维里提供的道义辩护几乎为后来给马氏“翻案”过程定下了范式与基调,这一点在波考克的《马基雅维里时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以共和主义的名义将马氏的所有言责一笔勾销的做法看似特具新意,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却是君主制与整个欧洲,这一占据了人类文明史大部分时间的制度被启蒙者宣告了道义上的毁灭。这样的做法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或“道德

① [德]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83页。

② 同上书,第52、81、82页。

③ 同上书,第89页。

④ 同上书,第86、88、90、98、99、106页。

主义”色彩，因此，波考克对这一思路的选择与发展也将不可避免地具有同样的色彩。^①并且，与迈内克的研究相似，对马基雅维里思想本身的探讨只是其研究的一部分，迈内克关心的是作为现代政治困境重要根源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产生与传播^②，而波考克关心的则是马基雅维里在“共和主义”传统脉络中的位置与意义——共和主义的道德正当性是其全部探讨的基础。

问题意识的差别使得波考克丝毫未提及迈内克的重磅著作，而迈内克通过对马基雅维里著作的精深研阅中总结出的三大核心概念或问题，波考克也未能覆盖周全。迈内克指出了“德性”“命运”“必需”（*necessità*，或译为“必然性”）以及“精兵”（*armi proprie*，字面义为“自己的军队”），最后一个概念并未引起迈内克特别的注意，而前三个概念实际上也仍不足以完全展示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实质，因此迈内克在分析中还使用了“善/恶”“目的”“自然”以及“理性”等古典政治哲学的词汇来搭建其基本的分析框架，唯其如此，马基雅维里在国家终极目的上的不明、相对主义、政治功利主义、“幼稚的一元论”、根本性的君主主义倾向以及在道德领域造成的灾难性混乱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展示。^③

波考克则只强调了马基雅维里的“德性”和“命运”概念^④，

① 波考克承认是他“选取”了“共和主义历史观”，承认其注重“词汇”的方法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承认忽视了马氏著作的许多方面，还承认他使用了“探索性”的解读法。[英] J. G. A. 波考克：《马基雅维里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冯克利、傅乾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89、90、109、167、168、194页。

② [德]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00页。

③ 同上书，第90、94、95、96、98、99、104、106页。

④ [英] J. G. A. 波考克：《马基雅维里时刻》，冯克利、傅乾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67页。